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重要源头

——重温习近平《尽快实现党风根本好转》

编者按

1983年4月11日，时任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全县第四次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深刻阐述了搞好党风的重要意义以及重点任务、要求和措施。这篇讲话，就是收入《知之深 爱之切》之中的《尽快实现党风根本好转》一文。35年后的今天，重温这篇文献，深感其中所阐发的重要思想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对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王 鹏

党风的好坏，决定人心的向背、党的命运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习近平在这篇讲话中，首先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深刻阐述了搞好党风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执政党的党风关乎党的生死存亡，“不但已为历史经验所证明，也是已为现实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真理”。党风的好坏，决定人心的向背；人心的向背，决定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党的命运。因此，“党风的根本好转，是实现四化建设、顺利进行改革的根本保证”。这一认识，彰显了习近平敏锐的政治眼光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人心向背这个最大的政治出发，狠抓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驰而不息正风肃纪，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厚植了党的执政基础。

党风不正的根子在于信仰缺失

革命理想高于天。习近平认为，党风不正的实质来源于极端个人主义，“忘记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根子在于没有牢固树立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世界观。因此，要对党员进行党性党风党纪的教育，“通过教育，使广大党员提高共产主义觉悟，坚定理想信念，提高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自觉性”。他还要求，要抓正反两方面的典型，特别是要选择有代表性的违纪案件，大张旗鼓地进行处理，充分发挥其反面教员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可能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他明确要求，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这些论述，彰显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是对管党治党规律的准确把握和运

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整顿党风、严肃党纪必须领导负责、全党动手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背后，是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党的观念淡薄、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习近平分析道，整顿党风、严肃党纪，绝不是某个部门可以担当起来的，各级党组织要领导负责，全党动手抓，抓头头、头头抓、一级抓一级，“只有书记带头、决心大，自身清、敢于抓，不怕难、敢碰硬，才能带动党委班子重视；只有党委重视，才能实现全党抓党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全面从严治党经验，明确提出，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全党动手；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党委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一级抓一级，层层传导压力。这些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抓住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牛鼻子”。只有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强化党的观念，切实担负起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才能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把查处案件和整顿党风结合起来

纪律检查工作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必须从政治和全局上来把握。习近平深刻指出，要注意把查处案件和整顿党风结合起来，与考察干部、整顿领导班子结合起来。对犯有不正之风的党员干部，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对一心扑在四化建设和改革工作上的同志，一定要给予充分的保护和支持”。这些重要论述，体现了大局意识和辩证思维，充分把握了“树木”和“森林”的关系，有利于治“病树”、拔“烂树”、护“森林”，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实践监督执纪“四种

形态”，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最大限度防止干部出问题，最大程度激发干部积极性，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得到净化。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继续把严管和厚爱、激励和约束结合起来，既对不作为、乱作为的干部敢于亮剑，又旗帜鲜明地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真正体现党组织对党员干部的关心爱护，实现纪法约束有硬度、批评教育有力度、组织关怀有温度。

把抓政治纪律放在纪检工作的首位

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要把抓政治纪律放在纪检工作的首位。”“严肃党纪，必须把政治纪律的检查放在首位。”“各级党组织、每一个党员都要按照党章规定，一切行动服从上级组织的决定，尤其是必须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全局的高度，进一步指出，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对于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而言，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最重要的就是把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根本政治任务落实好，这也是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的根本和灵魂。

把纪律检查组织和队伍建设好

执纪者必先守纪，律人者必先律己。习近平高度重视纪律检查组织和队伍建设，他认为，搞好党风，必须有一支坚强的有战斗力的纪检队伍。他殷切期望纪检干部敢于坚持原则，敢于斗争，真正成为捍卫党的纯洁性的坚强战士，成为“治病救人”的“医生”“护士”。他还要求各级党委要支持纪检干部的工作，“给他们撑腰，帮助他们提高思想水平，排除工作中的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如既往地关心纪检监察机关和队伍建设，他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纪律要求自己，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队伍，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被滥用、惩恶扬善的利剑永不蒙尘。打铁必须自身硬。新时代，纪检监察机关和纪检监察干部要自觉忠诚于党，确保政治过硬、本领高强、履职尽责、作风优良、自身干净，当好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党建文献

国民党为了对付共产党可谓不择手段，除了军事上的猛烈进攻之外，还采取了悬赏的办法。从总体上看，对于有着崇高共产主义信仰的共产党员群体而言，国民党的这个招数是失败的，根本不可能凭此战胜共产党，亦不可能挽救其统治的最终失败。

国民党在井冈山时期与中央苏区时期的悬赏

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期间，蒋介石对其他军阀采用的一个惯用伎俩，就是通过金钱收买的办法，使对方的部分将领临阵变节，以此达到瓦解对方的目的。由于许多军阀本身缺乏信仰，打仗的目的基本上以占领更多地盘或者获取更大利益为主，所以，蒋介石的这个办法屡屡奏效，这也让他在国民党各派军阀的多次较量中，特别是中原大战后取得了统治地位，进而调动了全国的战争资源用于对付红军。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在湘赣边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井冈山斗争，把湖南、江西两省的国民党当局搅得天翻地覆。苏联《真理报》在1929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几个月前何键宣布，悬赏五千万大洋捉拿朱德和毛泽东，捉住彭德怀和黄公略者可赏大洋两千元”。在湖南军阀何键看来，朱德、毛泽东比彭德怀、黄公略的“危害”更大，所以要多3000元。

朱毛率领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继而开创了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此又一翻江倒海之举，再次让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觉得颜面无存，因为直接威胁了其在江西的统治。

1930年7月28日的《江西民国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即《鲁总指挥严令缉拿朱毛》，指出：“兹特重赏资格，如前方剿匪各部队及各县

警队，能击毙朱毛献其首级者，合赏洋五万元，能活捉朱毛捆送来辕者，合赏洋十万元。”这个赏金是一年前何键的20倍，即活着的朱、毛二人都能值10万大洋，鲁涤平也是下了血本。由于种种原因，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被迫实施战略转移。就在此时，蒋介石于1934年10月25日发布悬赏令：“生擒毛泽东、朱德者，赏洋二十五万元。”据查，这个金额达到了对红军领导人悬赏的最高值，反映出蒋介石已经丧失理智，这次为了能彻底“消灭”红军主力，并“抓获”红军首领朱毛，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国民党在长征期间的悬赏

红一、二、四方面军及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一方面遭受了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阀的围追堵截，另一方面也要经常面对国民党的各种悬赏通告。

当然，随着红军的一路向西转移，在国民党特别是蒋介石看来，威胁早已不如以前，所以赏格的数量也发生了变化，一降再降。

如1935年2月9日的《大公报》，刊发了一则《蒋电川购匪首》，其中写道：“无论军民人等，凡拿获匪首者，一律均有重赏，特将赏格列后。生擒朱毛徐三匪首之一者，赏洋十万元。生擒彭德怀、林彪、董振堂、周恩来、张

国焘等匪首之一者，赏洋五万元。”

此时的中央红军尚未进入四川，红四方面军正在创建川陕苏区，不过，蒋介石可能预料到红军两部主力日后必将汇合，因而“未雨绸缪”下了这道命令。其中，点了八个人的名字，最主要的悬赏对象是中央红军的主要领导人朱德、毛泽东及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三人均值10万元；彭德怀等其他红军领导人，在蒋介石看来，也值5万大洋。

到了1935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主力，粉碎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阴谋，已经走出茫茫草地，进入甘肃南部地区，从而打乱了国民党围困红军的计划，革命前景趋于好转。蒋介石闻讯后，大为愤怒。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剿匪”第三路总司令朱绍良向甘肃的岷县等县的县长，转发了几天前蒋介石拍给他的急电。这份电报来了个“一网打尽”，也就是将红军的所有师级以上干部全部进行了“定价”，内容如下：

“一、毛匪泽东生擒者奖十万元，献首级者奖八万元；二、林匪彪、彭匪德怀生擒者各奖六万元，献首级者各奖四万元；三、博古、周恩来二匪生擒者各奖五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三万元；四、凡伪中央委员、伪军团政委、伪军[团]长及伪一、三军团之伪师长等各匪首生擒者各奖三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二万元；五、其他各著名匪首，凡能生擒或缺首级者，仍照前颁赏格各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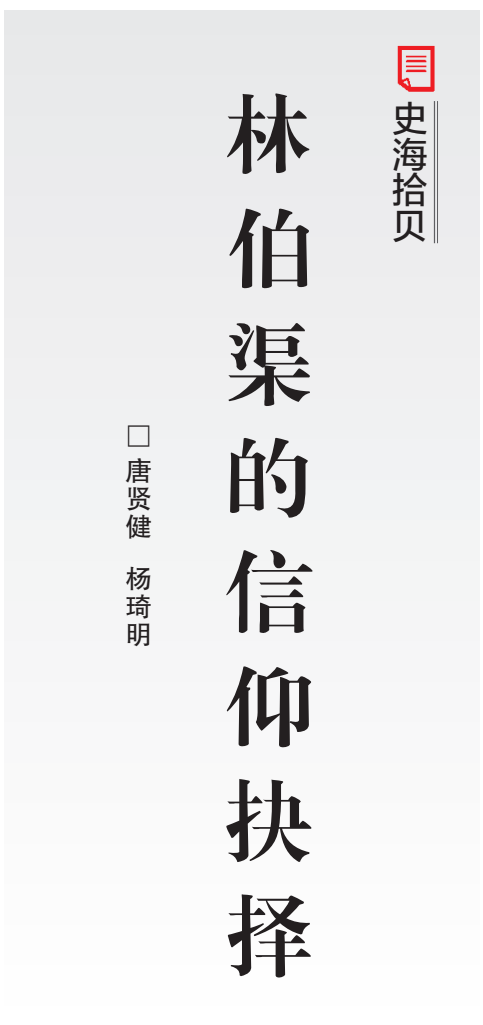
林伯渠是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他由追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者华丽转身，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始终坚守共产主义信仰，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东瀛初识马克思主义。林伯渠接触马克思主义最早是在他第一次留学日本期间。日本在20世纪之初，正是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十分活跃的时期。由他的老乡赵必振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在中国留学生中流传很广。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先后刊登过朱执信介绍马克思主义平和学说的文章、《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和林伯渠好友宋教仁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文章，这些著作让林伯渠知道了马克思和他的主张。

挚友介绍马克思主义。1915年，李大钊等人在日本组织了反袁团体中华学会，林伯渠、易象、容伯挺等人也组织了反袁团体乙卯学会。林伯渠为了促成两个团体的合并，多次拜访李大钊、易象等人，1916年1月30日最终合并为神州学会，并推举李大钊为议议长，林伯渠为干事，之后两人携手回国。正当林伯渠为了湖南的护法战争奔走四方，旧民主主义革命不断遭受挫折胜利遥遥无期时，“约在一九一八年三、四月，连续接到李大钊同志几次信，详细给我介绍了十月革命情况及一些小册子、文件，并对目前中国形势阐述了他的所见，得到很大的启发”，林伯渠正是依靠这些零碎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消除疑虑，逐渐握住了马克思主义真理。1921年1月，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林伯渠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50余名党员之一。

兄长助学马克思主义。1921年林伯渠到广州任总统府参议，他的堂兄林修梅任总统府代理参军长，两人一同居住在广州六榕古寺附近的牛巷。在林修梅的帮助下，林伯渠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阅读了大量有关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当时在广州既有大量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的文章，也有不少无政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介绍。林伯渠、林修梅对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比较分析后一致认为：“无政府主义主张不要政府，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乃是不切中国实际的空谈；中国的劳苦大众虽然辗转呻吟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官僚的压迫、剥削之下，目前尚缺乏组织，却蕴藏着无比巨大的革命力量，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无视这种革命力量，主张先发展实业，慢谈社会革命，无非是为资本家效劳。”最后他们得出结论“相信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在中国今日社会情形最为适合”。林修梅为了帮助林伯渠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甚至打算资助林伯渠前往苏俄，“实地视察苏维埃实际设施，以备日后参考”。

斗争抉择马克思主义。如果说中国青年一代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提高政治觉悟开始的，那么，林伯渠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就不仅是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而是同他多年的革命实践和艰辛阅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林伯渠参加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一次次的革命斗争换来却是一次次的失败挫折，林伯渠在这些痛苦经历中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进一步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念。他为国共第一次合作架设桥梁，推动了国民党的改组，为国民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作出了贡献。国民



革命军二次东征时，国民党右派分子掀起一股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共合作的逆流，时任国民党中执委和中央常委的林伯渠与在广东的其他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同发电痛斥，并号召海内外全体党员同右派分子进行坚决斗争。在国民党二大上，尽管有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责难，在林伯渠等人的努力下，国民党二大作出了弹劾西山会议派的决议、永远开除谢持、邹鲁的党籍，书面警告居正、石青阳、叶楚伦等人，训令戴季陶，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右派势力。

终生追随马克思主义。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案”后，林伯渠面临着关键选择。一边是经过20多年努力奋斗得来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等重要领导职务，另一边是获得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党籍，林伯渠作出正确选择，辞去了农民部长、中央财务委员、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等职，保留了中国共产党党籍。如果说这次面临的是权与利的考验，那么大革命失败时面临的则是生与死抉择。在这严重的历史转折关头，林伯渠毅然抛弃了为之奋斗了20多年的国民党，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展示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本色。当时林伯渠的好友兼亲戚程潜劝林伯渠登报宣布脱离共产党，但林伯渠“不经思索就毅然地拒绝了”，并且声明“要干就干到底，决不后悔，也不会计较将来个人的命运”。

其后，林伯渠参加南昌起义、前往苏联留学、奔赴中央苏区、踏上漫漫长征路、参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谈判、领导陕甘宁边区的建设，新中国成立后更是以极大的热情参与政权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不管面对再大的困难与危险，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的理想信念。

传单空投下来要悬赏缉拿他、徐海东、毛泽东。彭德怀下令要保存这些传单。这些传单都是单面印的，当时红军缺纸，就用空白的一面来印红军的宣传品。”虽然国民党的悬赏通告满天飞，到处都是，但彭德怀与毛泽东一样毫无惧色，而且把这些纸留下来用于印刷红军的材料，这是对敌人的一种巨大讽刺。

美国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提到了自己与朱德的一次交谈。朱德调侃道，蒋介石“甚至于公布了一个首级价目表，从班长开始，按照等级订定价。他派飞机到我们阵地上散传单。要是有哪一个人的名字没有列在名单里，或者给他开列的赏额太少，自己反而觉得是耻辱”。国民党飞机撒下的悬赏传单在被红军将领看到时，第一反应不是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而是自己的名字是否在名单里面，是否靠前，如果发现自己的赏额比别人少，还会懊恼不已，认为蒋介石目中无人。

综上所述，国民党作为统治者具备绝对的优势，通过不断对红军将领进行通缉悬赏，试图造成一种政治和心理上的震慑。其实，效果适得其反。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不仅坦然处之，而且激发了自己的革命热情，并时常拿这些悬赏互开玩笑。同时，包括报纸在内的国民党各种反动宣传报道，反而让广大群众间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认知了红军的一些将领，进而扩大了红军的影响。这也许是蒋介石在费尽心机草拟悬赏启事时所始料未及的。历史再次证明，真正决定战争胜负的不在金钱，而在民心所向。

党史文苑